

## 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源流\*

李竞能 李建民

当代西方人口学说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流行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口学说。我们考察它的学说源流,是要对其思想渊源和发展脉络有具体的了解。考察的范围以20世纪以来西方人口学说的主要派别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为限。

西方人口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蓬勃发展,空前繁荣。人口学已从经济学、统计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在另一方面,人口研究、人口学说又不断地和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数学和统计学等互相渗透,以其多学科的特点,日益为人所瞩目。追溯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源流及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历史时期来考察。

### 一、当代前驱(20世纪上半叶)

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西方人口学复兴的理论准备阶段,也是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奠基阶段。在这个时期,世界人口的发展形成了

新的格局。一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长期下降,已基本完成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过程;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上述人口转变过程未露端倪,世界人口规模仍在迅速增大,1930年已达20亿,而且增长速度日益迅猛。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广泛地为人们所关注,也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人口问题和人口研究的重视。在这个时期出现或发展,并作为当代西方人口学理论渊源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适度人口论的问世与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不能满足其军事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

\*本文是李竞能主编的《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导言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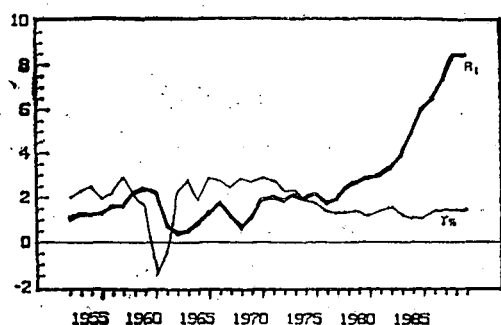


图 人口增长率与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变动曲线

巧合,而是反映了人口增长与差额人均收入

增长相反的变动关系。人口增长率越高,边际人口的数量就越大,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和对经济增长的阻滞强度就越高,从而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就越低;反之,人口增长率越低,边际人口的数量就越小,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强度和阻滞强度就越低,从而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就相对较高。因此,中国人口增长率起伏下降的变动趋势,是人口——经济增长长期起伏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责任编辑: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人口所)

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家和人口学者开始认为,“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都不是理想的人口状态,应该寻求“适度人口”。因此,在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适度人口”问题逐渐成为西方人口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

最先提出现代适度人口思想的人是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 1861~1935)在1888年写的《初级政治经济学》。最先明确提出“适度人口”这个概念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J.G.K. Wicksell, 1851~1926)<sup>①</sup>。而坎南在1914年出版的《财富论》一书,最先系统阐述了他的适度人口论。他认为,人口是否需要增加,不仅要看它对农业收益的影响,而且还要看它对全部产业的影响,即人口增长使工农业收益递减还是递增<sup>②</sup>。他指出,任何时候工农业生产都有一个“最大收益点”,假如人口还没有大到足以使全部产业达到这个最大收益点,便是“人口不足”;相反的,假如人口增长已超过最大收益点,便是“人口过剩”,“这时解救的办法则是减少人口。”<sup>③</sup>在他看来,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最大收益点的人口是最理想的人口,实际上也就是“适度人口”。

继坎南之后,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论适度人口的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卡尔·桑德斯(Carr-Saunders, 1886~?)。他在1922年出版的《人口问题》一书指出,“提供按人平均的最大收益”的人口,是人口的“适度数量”<sup>④</sup>。桑德斯在1925年再版的《人口》一书中又论述了人口的“适度密度”,即使居民获得高生活水平的密度<sup>⑤</sup>。

到二三十年代,适度人口研究形成西方人口研究的热潮。同时,受福利经济思潮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开始用福利的观点来论述适度人口。例如法国著名学者兰德里(A. Landry, 1874~1956)认为适度人口是能保证人类的最大幸福的人口。这种“古典

的”适度人口论虽然还是静态适度人口论,但是已为当代的动态适度人口论打下了基础,并且是人口目标规范研究的先声。

## (二) 人口转变论的出现

西方人口学说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人口转变论”的创立。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历史过程的基本结束,一些西方人口学者开始用历史的实证方法,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过程、主要阶段和演变规律,特别是分析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原因,从而开始创立“人口转变”理论。法国人口学者兰德里和美国人口学者沃伦·汤普森(Warren Thompson, 1887~1973年)被认为是“人口转变论”的初创者、奠基者。

兰德里在1909年发表的《人口的三种主要理论》中就已提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发展经历了原始阶段、中期阶段和现代阶段<sup>⑥</sup>。他在1934年出版的《人口革命》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人口发展三阶段,并把两个阶段间的人口转变称为“人口革命”<sup>⑦</sup>。

汤普森在1929年发表的《人口》一文,联系经济发展和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动趋势,把世界人口分成三类地区:第一类是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少受控制,保持在高水平,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国家(亚洲、非洲、南美国家);第二类是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但是死亡率的下降比出生率更快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中欧各国);第三类是

① 参看威克塞尔的“论适度人口”,刊于《新一代》,1910年10月版。

② 坎南:《财富论》,伦敦1920年第二版,第66~67页。

③ 同②,第69页。

④ 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的研究》,1929年版,第476页。

⑤ 参看卡尔·桑德斯:《人口》,1925年版,第五章,“适度密度”。

⑥ 参看基拉德(A. Girard)为兰德里所著《人口革命》(1982年版)一书写的序,第9页。

⑦ 兰德里:《人口革命》,1982年巴黎版,第169页。

出生率、死亡率都迅速下降,而出生率的下降已比死亡率更为迅速,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相应下降的国家(西欧各国等),这时人口发展处于稳定低增长甚至减少的状态。由此反映了人口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sup>①</sup>

人口转变论在这个时期虽属初创,但是它 对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最先打破了以往人口研究限于考察总人口变动的框框,开始分析人口内在因素,即考察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及其原因和后果。后来生育率研究就成为当代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其次,它最先结合人口再生产过程探讨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为研究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开拓了一条新路。此外,人口转变论在其初创阶段虽然还未摆脱理论演绎的影响,但大体上已经是依据人口统计资料和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开了当代人口实证研究的先河。

### (三) 社会学派人口学说的发展

自社会学创立以来,人口始终是西方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逐渐形成人口研究中的社会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社会学家都发表了人口论著。其中法国社会学家阿森·杜蒙特(A. Dumont, 1849~1902年)和美国社会学家沃伦·汤普森最为著名。

杜蒙特在1890年出版的《人口与文明——人口学的研究》和1901年出版的《人口学的道德基础》中,以社会学观点研究人口问题,提出和论述了“社会毛细管学说”。他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解释法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发展长期停滞的现象。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 一种想从社会上低的地位向高的地位上升的倾向。”<sup>②</sup>人们不断地在社会阶梯上向上攀登,恰好和灯油依靠灯芯上升相似,“这样的现象就叫做社会的毛细管现象”<sup>③</sup>。在现代社会,上升的机会越多,人们上升的欲望越大,社会毛细管现象也越强。人们为了减轻向上发展的负担,就要求减少生育,所以生育率变动同社会毛细管现象成反比例。他

这个理论对当代人口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最先系统地分析了社会流动同生育率变动的关系,而且还在于它触及人类生育行动的变动机制。

汤普森不仅是人口转变论的创立者之一,而且是三、四十年代西方人口研究中社会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1930年出版的《人口问题》一书,到1942年再版时已成为社会学派研究人口问题的代表作。他强调人口研究的综合性和经济以外社会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把社会进化的、生物的、福利的观点都折衷在一起来分析人口问题。他特别重视人口数量和社会福利的关系,认为考察人口问题,“不能离开人类现在和将来的福利”。<sup>④</sup>他反对用“纯经济观点”来说明“适度人口”,认为社会组织、技术发展、人口构成和密度、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工作习惯,甚至宗教都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有重大影响。他最先系统地分析了差别生育率,特别是不同阶级的差别生育率。

### (四) 数理学派或统计学派人口理论的发展

在20世纪初期,对人口进行应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研究,获得了两个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稳定人口”模型的创立和“逻辑斯蒂曲线”的发现。

美国人口学家洛特卡(A. J. Lotka, 1880~1949)运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在1907年首次提出“稳定人口”理论<sup>⑤</sup>。他认为,如果一个封闭的人口

① 参看汤普森:“人口”,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4卷第6期(1929.5),第959~975页。

②③ 杜蒙特:《人口与文明——人口学的研究》,1890年巴黎版,第106页。

④ 汤普森:《人口问题》,1942年版第5页。

⑤ 参看洛特卡:“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科学》新系列(1907年7月5日)第26期(总653期),第21~22页。

⑥ 参看都柏林和洛特卡:“论真正的自然增长率”,《美国统计学会杂志》(1925年)第20期,第305~339页。

按照固定不变的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而变化,经过一个时期之后,该人口的年龄构成将处于稳定状态。1925年洛特卡进一步运用数学方法,求出了稳定人口模型的三个基本公式<sup>①</sup>。他认为,最终形成的稳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真正的”或“内在的”自然增长率。

洛特卡的“稳定人口”理论,在西方人口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它对于人口资料的评估与估算,人口再生产长期发展趋势研究以及对人口过程各种变量的深入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因此,洛特卡的“稳定人口”理论被西方人口学者推崇为人口学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逻辑斯蒂曲线”(Logistic Curve)是由雷蒙德·珀尔(Rogmond Pearl, 1879~1940年)和里德(Lowell J. Reed)在1920年重新发现的。他们用对果蝇做集团实验的方法,发现了和维尔乌斯特(P. F. Verhulst, 1804~1849年)在1838年已经提出的同样的“逻辑斯蒂曲线”,立即在西方人口学界引起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人口增长是循环的,并提出了五个前提条件<sup>②</sup>,即:

(1)空间是有限的;(2)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增长有最大限度;(3)它的最小限度是零;(4)它的增长带有文化阶段性或者循环性,是积累性的;(5)人口增长的一般形态,起初是增长速度上升,最终达到最大点,以后渐减,而达到一个为特定空间和文化阶段所规定的人口极限。

“逻辑斯蒂曲线”所以在当时西方人口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主要由于它描述了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而这正是当时西方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此外,它所描述的人口发展趋势恰与“人口转变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它在研究方法上也给当代人口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工具。

#### (五)“经济停滞论”的出现

西方人口研究,特别是生育率研究,一

方面包括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包括人口变动、生育率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后一方面的研究,在30年代中叶以后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人口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把1929~1933年经济危机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人口增长率的长期下降,则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在1937年发表的《一个衰减中的人口若干经济后果》里,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人口增长率衰减对资本有效需求的影响。他指出,“资本需求取决于三个因素:人口、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sup>③</sup>。由于现代经济条件的变化,资本技术对资本需求的影响已经不太大,因此,“资本需求的增加,主要应归因于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sup>④</sup>,如果生活水平没有足够的提高,人口减少会使资本需求减少,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如果人口长期处于衰减状态,有效需求不足也会长期存在,并导致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凯恩斯的观点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汉森(A. H. Hansen, 1887~1975年)和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 F. Harrod, 1900~1978年)等人继承。

尽管他们的理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把人口变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考察,使西方经济学界重新重视人口问题,对当代西方人口研究有重大影响。实际上,他们有关人口经济问题的理论,后来已成为西方宏观人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 (六)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均衡分析的兴起

<sup>①</sup> 参看珀尔:《人类生物学》,巴的摩尔1924年版,第567~599页。

<sup>②</sup> 见《凯恩斯全集》第14卷,1973年版,第126页。

<sup>③</sup> 同<sup>②</sup>,第128页。

当代西方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进行微观经济分析。它在这方面的分析工具主要来自西方微观经济学。直到30年代中叶,以马歇尔(A. Marshall, 1842~1924年)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微观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支配地位。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对当代西方生育率微观分析有极大影响。

西方微观经济学对厂商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效用)分析,是当代西方人口学对个人生育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范本。与此同时,如均衡分析、边际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替代原理、收入效应、无差异曲线、生产函数等概念,需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观点,都为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 二、复兴时期(40年代中叶至50年代末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进入了一个复兴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诺特斯坦(F. W. Notestein, 1902~1983年)在1945年发表的《人口——长远观点》和1953年发表的《人口变动的经济问题》,继承了汤普森的观点,提出了体系更为完整的人口转变论的理论模型,被看作是当代西方人口转变论的创立者。其间,布莱克(C. P. Blacker)在1947年发表的《人口增长的阶段》,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在1957年出版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金德伯格等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等都提出了各自的分阶段的人口转变理论模型。寇尔(A. Coale)和胡佛(E. Hoover)在1958年出版的《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一书,更把人口转变论运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过程。从此,人口转变论确立了它在西方人口研究中的地位,

成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人口学说之一。

(二)“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在西方又盛行起来。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的带动下,世界人口规模迅速地扩大,同时失业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困扰西方世界。于是马尔萨斯主义人口增长控制论乘势而起。皮尔逊(F. A. Pearson)和哈帕(F. A. Harber)在1945年发表《世界的饥饿》,福格特(W. Vogt)在1948年出版《生存之路》,赫茨勒在1956年发表《世界人口危机》等等,使西方世界又笼罩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阴云,“人口过剩”的警钟越敲越烈。

(三)人口社会学脱颖而出。战后人口研究虽然日益独立化,但是社会学家仍很重视人口研究,二者的再度综合使社会学派人口学论,或者人口社会学仍在人口学界占据重要地位。金·戴维斯(Kingslay Davis, 1908—)1949年出版的《人类社会》,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出生、死亡、迁移等人口变量及其变动原因。他在1959年发表的《人口学行为的社会学》中,更进一步阐述了人口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人口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大大推进了有关生育行为、婚姻、家庭人口学等方面的研究。

(四)战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宏观人口经济学。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彭格勒(J. J. Spengler),刘易斯(W. A. Lewis),西蒙·库兹涅茨(S. Kuznets)及寇尔(A. Coale)和胡佛(E. Hoover)等。斯彭格勒被西方学者称为“当代最杰出的人口经济学倡导者之一”<sup>①</sup>。他在这个时间发表的《人口增长的经济方面》(1947),《社会经济的增长理论》(1949);《人口模式》(1954)和《经济学与人口学》(1959)等论著,成为西方宏观人口经济学的重要文献。

<sup>①</sup> J·奥威毕克:《人口理论史》中译本(1988),第187~188页。

刘易斯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1954),把经济发展研究扩展到欠发达国家,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研究了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和现代部门的就业容量,开拓了人口经济研究的新领域。

库兹涅茨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在1946年发表的《1869年以来的国民产值》一书和1958年发表的《人口增长和有关经济变量的长期波动》一文中,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波动和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他的“人口经济增长波动”理论在西方宏观人口经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五)人口学说的系统化和人口学体系的完善化。联合国1953年出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几乎把人口研究各个主要领域已有的学说和观点都作了系统的归纳。在50年代,也有不少学者企图使人口学体系完善化或建立自己的人口学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lfred Sauvy)于1952年初版的《人口通论》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豪泽和邓肯出版的《人口研究》(1959)等书。索维在其《人口通论》中,以动态经济适度人口论为主线;针对法国人口长期衰退问题,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人口学体系。

在50年代末叶西方人口研究出现了开始自宏观分析转向微观分析的新动向,这一趋势最先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莱宾斯坦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1957年)一书中。他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宏观分析之后,在研究生育率转变的机制时转向微观分析,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作了成本——收益分析。这预示着西方微观人口学即将兴起。

### 三、扩展时期(50年代末叶至70年代末叶)

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世界人口增长最

迅速的阶段,也是当代西方人口学扩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原有的一些人口理论为宏观人口经济理论,适度人口理论继续发展外,还出现了不少新的理论和观点,同时还形成了一些人口学分支学科。这是当代西方人口学说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微观人口经济学和家庭人口学研究的兴起

在这个时期,西方人口学说最重要的发展是微观人口研究的兴起,特别是以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为核心的微观人口经济学,亦即生育率经济学或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此外,着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家庭人口学研究、家庭人口社会学也有长足的发展。

继莱宾斯坦之后,西方不少学者发表了有关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分析的论著。其中最著名的如贝克尔(G. Becker)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时间分配理论》(1963),以及他与刘易斯(H. G. Lewis)合写的《论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1973)等;威利斯(R. J. Willis)的《生育行为经济理论新探》(1969)以及他和桑德森(W. Sanderson)合写的《生育率经济模型》(1971)等。此外,保罗·舒尔茨(T. P. Schultz)的《家庭计划和生育率的一个经济模型》(1969),《生育率的经济学说》(1973),尼尔拉夫(M. Nerlove)的《家庭户与经济》(1974)等也颇有影响。西奥多·舒尔茨(T. W. Schultz)在1974年主编和出版了《家庭经济学:婚姻,孩子和人力资本》一书,也表明西方微观经济学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

这个时期的微观经济学,大都从西方消费需求理论出发,把孩子看作“耐用消费品”去分析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应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提出了诸如“孩子数量和质量替代理

论”、“劳动——闲暇时间分配理论”、“家庭效益最大化”、“家庭效益优化和合理选择”等学说，一时各说纷纭，使微观人口研究、特别是生育率的微观分析成为这个时期西方人口研究的主流。

在这个时期，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微观人口研究、家庭人口社会学研究也蓬勃发展，对家庭的规模与结构、家庭生命周期、社会变动及其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等研究，都有重大推进。托马斯·伯尔奇(T. Burch)的《家庭规模与结构》(1967)，福特(T. R. Ford)和德琼(G. F. DeJong)主编的《社会人口学》(1970)，特别是其中弗里德曼(R. Freedman)所写的《生育率社会学》，格利克(P. C. Gluck)的《家庭生命周期的现代化》(1977)以及塔欧伯尔(K. E. Tauber)等人主编的《社会人口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这个方面的研究作出贡献。此外，澳大利亚人口学者卡德威尔(J. C. Caldwell)所提出的“代际财富流理论”，对西方生育率微观分析也有独特的见解和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死亡率研究的复兴。西方死亡率研究在相对沉寂一个时期之后，开始直追生育率研究，在这个时期也有重要的进展。早在50年代，有关性别、年龄差别死亡率研究已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重视。同时，一些研究人口转变的学者，也分析了死亡率转变问题，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死亡率转变，柯尔和胡佛1958年对低收入国家死亡率的分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到六七十年代，死亡率研究领域更扩大到联系教育、职业等人口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同时对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并且已经开始用模型生命表作为分析死亡率的工具。普雷斯顿(S. H. Preston)和凯菲茨(N. Keyfitz)合写的《死亡原因：国家人口生命表》(1972)，普雷斯顿的《死亡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变动关系》(1975)，《二十世纪以来欠发

达国家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和后果》(1979)，卡德威尔的《教育作为死亡率下降的一个因素》(1979)等，都是这个时期西方人口死亡率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作。

(三)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也有显著发展。这个时期西方人口迁移研究，不仅考察人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农业和工业等不同部门之间的迁移和流动，对人口迁移趋势作宏观分析。而且研究个人或家庭的迁移决策过程，对迁移原因和后果进行微观分析，成为西方有关迁移的实证研究的主要课题。在这个时期，如费(J. C. H. Fei)和拉尼斯(G. Ranis)的《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1964)，E. S. 李(E. S. Lee)的《迁移理论》(1966)等著作在西方迁移理论中较有影响。

(四)现代控制人口增长理论进一步流行，“增长极限论”和“零增长理论”兴起。在这个时期，西方学者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的分析，已从“人口——粮食”、“人口——土地负载能力”等模型，转向“人口——资源”和“人口——生态环境”等模型，分析方法上也更多地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把人口纳入世界发展的大系统来考察。埃利奇(P. R. Ehrlich)的《人口爆炸》(1968)，泰勒(G. Taylor)的《世界末日》(1970)，变本加厉地把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悲观结论推向极端。由麦多斯(D. L. Meadows)等人执笔的《增长的极限》(1972)，更以人口和粮食、资源、环境的系统分析，论证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极限。一些西方学者则在控制人口增长理论和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零增长理论”，诺特斯坦在1970年，斯彭格勒在1976年，都发表过题为《人口零增长》的论著。

(五)人口学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作为当代西方人口学说扩展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是许多人口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人口统计学也取得很大的进展。以人

口经济学来说,一方面微观人口经济学,特别是生育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另一方面宏观人口经济学继续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伊斯特林(R. Easterlin)所发表的《论经济因素对现在的和预期的生育率变动的关系》(1966),《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长波》(1968),《生育率的社会经济理论》(1969)等,对西方人口经济研究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斯彭格勒在1972年出版的《人口经济学》一书,更被看作是西方人口经济学已经成熟的一个标志。

在这个时期西方人口研究已经超越出生、死亡、迁移等人口变量的范围,开始注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方面的研究。后者可以举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为例。他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1961)、《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人力资源》(1972)等著述,给西方人口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 四、多元化、深化时期(70年代末叶以后)

70年代末叶以后,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的发展,进入了多元化和深化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口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定的进展,但仍以生育率控制问题的研究为主流。对生育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的生育决策机制,家庭规模和类型的选择,婚姻制度与家庭未来的前景以及它们与生育决策内容和决策过程的关系。在这期间,生育率研究的“中介变量学说”日益盛行,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各种中介变量对生育过程的影响,成为重要课题。邦加茨(J. Bangaarts)等人在1987年编的《家庭人口学:方法及其应用》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西方生育率研究虽然有转向非经济因素分析,转向人口社会学的倾向,但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生育率变动,在这个时期仍占极大比重。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生育率经

济分析已由以需求理论为主转向供求论,从供与求两方面来分析生育率变动。伊斯特林等人1985年出版的《生育率革命:供给——需求分析》一书应当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个时期,西方人口学关于死亡率的理论研究,也开始摆脱长期落后于生育率研究的状态,出现了新的气象,即由单个或几个因素分析转向多因素综合分析,从宏观分析转向微观分析,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用模型生命表分析死亡率,方法也日趋完善。在这个时期,西方一批研究死亡率的著作,如:莫斯利(W. H. Mosley)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社会决定因素》(1980)和《孩子存活的生物的和社會經濟的決定因素》(1985);保罗·舒尔茨的《家庭户经济学和作为死亡率决定因素的社区变量》(1985);麦哈德温(K. Mahadevan)的《死亡率、生物学和社会》(1986)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死亡率研究的多元化和深化。人口学分支学科独立发展的势头在这个时期一直未减,而且有越来越专门化的动向。人口老化问题已不是发达国家独有的课题,已推进到某些发展中国家,而且出版了一批理论性很强的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专著,如弗斯(D. A. Wise)主编的《人口老化经济学》(1988)。还应指出,女性人口研究在当代西方也有成为人口学独立的分支学科并出现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如韦尔(H. Wure)的《妇女、人口学和发展》(1981)就是一例。

总的说来,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在战后有长足发展,尤其是在上述扩展时期。然而,就总体而言,西方人口学的理论研究仍远落后于其应用研究,当前尚无重大的突破性的理论创新。

(本文责任编辑:张京华)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